

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 Technology
and Ethics of the Body

周丽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YJA720044）

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 Technology
and Ethics of the Body

周丽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周丽昀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671-1455-5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429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章 斐 金 鑫

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

周丽昀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 字数 243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455-5/B·080 定价: 36.00 元

序言 | preface

周丽昀博士经过几个春秋的不懈探索,终于完成了这部题为《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的著作。在全书修改与统稿期间,她就约我为此书写序。我虽对身体伦理这一研究方向上的最新进展缺乏足够的了解,但仍勉力应约。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弟子,有着割舍不断的师生情谊,更在于本书以(人的)身体为新的焦点,深入解析了令人感兴趣的有关人与技术、技术与伦理两大关系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从地球上诞生伊始,就与技术结下不解之缘,产生了备受关注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但是,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技术哲学建立之后,人们才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开展了专门的研究。最初的研究表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知,是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少学者正是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出发,提出或建构他们的理论学说的。例如,1877 年德国哲学家 E. 卡普在其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从新的观点考察文化发展史》一书中提出“器官投影”说,认为人体的外形和功能总是作为人类最理解的客观实在,被当成创造技术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投影到外部环境;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技术本源,都是建立在人体器官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工具的本质即是人的肢体器官的投影(模仿与延伸),人恰恰是通过制造工具而不断创造自己的。这种把技术看作是人体器官延伸的观念,揭示了技术的“为人”属性,暗示了技术史本身就是技术针对人的身体的缺陷而进行的矫正史,折射出人与技术的发展在本质上的一致性。1981 年,德国哲学家 F. 拉普在其所著的《技术哲学导论》中进而指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联系,这种交互联系可以划分为两个方

面：(1) 人创造了技术；(2) 技术(人创造的)塑造了人。”这里阐发的人是技术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技术的塑造物的思想观点，无疑是将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耦合在一起，使内在的合目的性与外在的手段性结合在一起，超越了传统的工具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和人类学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人的行为)。

然而，就整个 20 世纪技术哲学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之研究，人的身体几乎是被忽视的，或者说基本上是“缺席”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是被关于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和对技术后果的批判性反思所主宰。尽管技术哲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经验转向”，一些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始致力于探究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和现代技术的哲学问题，但由于深受身心二元论的影响，上述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不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技术哲学学科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出现了身体复归的普遍情况。丽昀博士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了这种身体理论的新走向，她通过对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美学、身体伦理学等与身体理论研究相关的领域的考析，并汲取当今著名技术哲学家(如 T. 伊德、C. 席林等)的有关思想资料，紧密联系现代技术发展的实际(诸如赛博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赛博格等)，阐发了身体与技术相互建构的“一体两面”思想，亦即一方面，身体之于技术，身体是技术的来源和场域、隐喻和符号；另一方面，技术之于身体，技术通过身体取代、身体延伸和扩展等形式影响身体，身体是技术的身体、技术化的身体。并提出了“身体是人存在的根本规定性”、“身体是自我的一个标志”、“人是一种涉身性的技术存在物”、“身体既是体验的、涉身的，又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等新的论断。我相信读者不难发现，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对于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认知。在我看来，这即是丽昀博士在本书中所呈献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在本书中，丽昀博士所呈献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以身体作为新的视阈，剖析了技术与伦理的问题。一般认为，技术与伦理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伦理对技术具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使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另一方面，技术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技术发展

的需要。但是,由于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身体与技术的相互建构,致使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加剧,技术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丽昀博士完成了下述两项互为关联的任务。一是以身体作为理解技术与伦理的独特视阈,通过对基于身体体验和感受的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探索如何处理技术与伦理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形成技术与伦理的必要张力提供理论依据;二是通过对现代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探讨,揭示伦理困境及其根源,阐明伦理学的范式从传统的主体伦理学向身体伦理学转变的必然性。

据考查,“身体伦理学”这一术语,最先出现于 M. 许尔德瑞克和 R. 麦基丘克在 2005 年出版的《身体伦理学:后习俗的挑战》这一论文集中,但他们对什么是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并未作答。值得称道的是,丽昀博士以无畏的理论勇气,富有建设性地从理论基础、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等方面论述了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她提出,身体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涉身自我”,而非普遍的理性原则;不可判定性、非确定性和特殊性(个体体验、个体生活等)是身体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身体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女性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后结构主义方法等。她指出,身体伦理学中的身体,是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一心一世界”三重结构的身体,它既是身心交织的身体,又是感知的身体、体验的身体、开放世界和多元情境中的身体;所谓“涉身自我”,是指自我形成过程中身心因素的相互交织,具有自我与躯体的不可分性以及身体的含混性和可变性;在传统的主体伦理学中,由于身体的“缺席”,使其主要的伦理原则(如尊重自主性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等)变成了追求普适价值的抽象概念,不能很好地应对不同道德境遇中的伦理困境,而建立在“涉身自我”概念基础上的身体伦理学对主体伦理学的批判与重构,正在于它以不可判定性、非确定性和特殊性的伦理三原则打破了主体伦理学的确定性思维模式,能够积极回应现代技术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

丽昀博士所阐发的上述思想观点,对于探寻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必要张力、推进技术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作为生命伦理学新范式的

身体伦理学之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将这本《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研究》与丽昀博士七年前发表的《当代西方科学观比较研究》一书作一比对。这两部著作的主题迥然不同,但本质上却有着内在的契合和关联。无论是以往对实践科学观的探讨,还是如今对“现代技术与身体伦理”的研究,都是对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之上的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预设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我十分赞赏她的锲而不舍的坚持和探求新知的精神。今日所得之新颖硕果,绝非偶然,这是她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理论诉求和学术积淀的一种展现。在当下浮躁弥漫的学术界,实属难能可贵。寄希望于她,能在现在的试探性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对于身体伦理学作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为这门学科能确立自己的话语、范畴、原理和体系并成为显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陈其荣

谨识于复旦大学中心村寓所

2014年5月30日

目 录 | Contents

导 论 技术、伦理与身体的三重奏	1
一、技术的内化与身体的不确定性	1
二、从主体伦理学到身体伦理学	7
三、身体作为研究技术与伦理的独特视阈	14
第一章 身体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复归	24
第一节 多学科研究中的身体复归	24
一、关于身心关系的哲学研究	25
二、关于身体社会学的研究	26
三、关于身体政治学的研究	29
四、关于身体美学的研究	30
五、关于具身认知的研究	32
六、关于身体伦理学的研究	33
第二节 理论流变：从二元论到非二元论的转化	35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36
二、尼采的“我就是我的身体”	39
三、福柯的身体谱系学	41
四、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观	43
第三节 实践推动：作为主体的身体和作为客体的身体之间的 张力	55
一、消费主义的兴盛与符号的身体	55
二、性别关系的转换与权力的身体	58

三、高科技的发展与作为主客体场域的身体	61
第二章 技术与身体的现代联姻	64
第一节 身体之于技术：从来源和场域到隐喻和符号	65
一、身体作为技术的来源和场域	65
二、身体作为技术的隐喻和符号	69
第二节 技术之于身体：从“技术的身体”到“技术化的身体”	80
一、伊德的“技术的身体”	81
二、席林的“技术化的身体”	92
第三章 “伦理的身体”与身体伦理学	99
第一节 “伦理的身体”何以可能	100
一、何谓“伦理的身体”	101
二、“伦理的身体”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	104
第二节 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范式	108
一、身体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110
二、身体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114
三、身体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及案例分析	122
第三节 身体伦理学的价值趋向	141
一、塑造自我反思的伦理学	141
二、促进更加民主公正的技术实践	142
三、拓宽伦理实践的适当性范围	145
第四章 现代科技引发的身体伦理问题	147
第一节 生命科学中的身体伦理问题	148
一、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困境	149
二、生命伦理学陷入困境的原因	156
三、身体伦理学对生命伦理学的批判和重构	162
第二节 赛博空间中的身体伦理问题	174
一、赛博空间释义及微媒体时代的空间特征	175

二、赛博空间中身体伦理问题的凸显	179
三、以身体为界面的赛博伦理思考	196
第三节 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中的身体伦理问题	209
一、信息系统产品设计中伦理问题的凸显	211
二、信息技术产品设计伦理问题的成因	216
三、基于身体体验的设计伦理思考	220
第五章 结语：“在途中”的技术、身体与伦理	235
一、重新审视伦理与身体	235
二、不存在“没有身体的思考”	237
三、超越身心二元论	239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7

导 论

技术、伦理与身体的三重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身体逐渐变成一个时髦的话题。身体曾经只是生物学领域的话题,而如今所讨论的话题则日趋广泛,从身份认同、社会运动、消费文化、伦理学到社会理论和哲学等,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里,身体逐渐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和焦点。因此之故,身体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体社会(somatic society)中,“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这一渠道来表达”^①。

身体之所以成为当代的某些焦点话题争论的前沿,大致是因为:一方面,对那些致力于本学科领域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身体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范畴和焦点;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增加了身体的不确定性,身体甚至成了正在消失的前技术文化的残留;与此同时,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身体”变成了一个与两者都纠缠不清的因素。因此,在当今的技术背景下,技术与身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以身体为界面和视角,去解读现代技术所引发的种种伦理问题?如何在技术、身体与伦理的联结中,去反思技术与人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技术的内化与身体的不确定性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也愈

^① Turner, B.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6.

发剧烈：一方面，科学技术在试图摆脱身体的羁绊；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似乎又在努力效仿身体的功能。一方面，科学技术在不断挑战身体的极限；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不断重建与身体的秩序。如同法国学者大卫·勒布雷东(David Le Breton)所言：“科学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颇为矛盾：身体是科学的反例，科学对它进行模拟加工。科学试图摆脱身体的影响，但同时，科学又一直尝试以其特有的方法笨拙地对它进行复制。或许，整个科学史本身就是科学针对身体的缺陷(科学眼中的)进行的矫正史，充满为增加其稳定性和冲破其局限性而添加的修改符号。同时，科学还仿效造物主，渴望模仿身体，发挥技术作用对其施加的影响。”^①

一直以来，技术也被理解为是对当代的身体意义造成威胁的主要力量之一，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在科学所描述的物质世界和生活经验领域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②换句话说，我们与技术的互动开辟了一块经验的领域。在当今时代，技术与身体的联结是显而易见的。从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整形手术、赛博空间到消费领域，在现代技术所及之处，身体所面对的选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些趋势一方面增进了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身体受他人控制或者被异化和伤害的可能性；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清楚技术对身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瓦解着身体与身体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以及身体与技术之间的传统界限，从而加剧了人们对于身体的不确定感。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讨论：“何为身体？”“身体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身体的边界在哪里？”“我们该如何拥有和控制身体？”“什么样的身体值得拥有？”等等。技术与身体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变得令人关注。

对于技术的身体而言，如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第一个是“赛博空间”的广为传播。“赛博空间”是指那些通过计算

① [法] 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② Hansen, M. *Embodying Technesis: 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60.

机或者电子媒介的传播产生的“信息空间”或者“技术空间”^①,人们在这些虚拟空间中可以不必通过与他人的身体共在而互相影响。赛博空间是对现实世界存在的一种模拟和再创造,赛博空间的诞生瓦解了身体的物理—生理存在的束缚,是对身体感觉的极大拓展,也开启了身心关系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构建这种虚拟空间的技术包括多媒体交流、互联网、视频会议、数字电视、移动电话以及电子监控等。另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例,包括增强现实和幻影成像在内的各种技术,通过运用计算机进行合成影像投射,就可以使主体的意识和躯体融入对象场景中,产生“逼真”的浸淫体验。比如,Microsoft Xbox 360 配备的 3D 体感周边外设摄影机 Kinect,就能够同时导入即时动态捕捉、影像辨识、麦克风输入、语音辨识、社群互动等功能。Kinect 技术不只彻底颠覆了家庭游戏室或家庭影院等娱乐设施的单一操作模式,其背后呈现的全新的人机互动理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办公、医疗和交通等领域。如唐·伊德(Don Ihde)所言:“当代图像技术所做的就是反映那些超出人类的感知能力的现象。”“当代图像技术所做的就是把(人们)感知不到或者无法察觉的东西转换成可感知的。”^②虚拟现实技术不但可以模拟现实客体,创造奇幻人物,还同时建构出一种新型的网络社会关系,从而改变人类互动交流的模式,变革社会组织的架构。随着网络技术在配置各类资源方面显现出的卓越优势,由各种虚拟平台分割、组建并无限丰满的网络空间,正在逐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拉向虚拟空间。在网上,浏览信息、游戏娱乐、交友互动已经不再是网民的主要目的,更多的活动层出不穷: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空间、创建可逆的虚拟人生、凭借爱好和专业或其他特征加入或组建社交圈、建构低成本高效益的商业交易平台……赛博空间的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近数十年来所发生的‘移居赛博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的轮廓”^③。

① Munt, S. “Instruction”, in Munt, S. (ed.), *Technospace*, London: Continuum, 2001, p. 11.

② Ihde, D. “Postphenomenological Re-embodiment”, *Found Sci*, 2012(17), pp. 375-376.

③ [荷兰] 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第二个是身体的内在部分被移植或改变的技术(如修复术和整形术等)。“我们面临一些新的制造身体或者再造身体的方式。单一的、有界限的、碳基材料的身体被技术和实践的增殖和进化所代替,这使得新的身体的增加、改变和发明成为可能。”^①人工智能技术对身体的“模仿”与“替换”,将身体抛向边界模糊的论战中。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假肢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曾经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假肢或人造脏器得以实现。2006年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展览会上亮相的C-Leg[®]智能仿生腿融合了计算机科学、仿生学和机械学等相关技术,在保证原有假肢的安全、稳定和生态特性以外,突破了机械产品与身体无法相融的生物局限,使假肢成了具备“接收”、“思考”和“反馈”的能力的“肢体”,令使用者仿佛拥有一双“真正的”双腿。又譬如,为了改善残障人士生活质量、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定期资助设计师协会开发残疾人使用的电子产品。韩国数字机会和推广协会(Korea Agency for Digital Opportunity & Promotion)近年来发明的许多残疾人专用电子设备产品,包括放大视图桌面阅读器 Sense View、便携式文本到语音转换设备 Voice Eye Mate、非手动游戏手柄鼠标 Jaws2 以及无线电播放器 Joy-10 等。^②这些产品不但在功能上,甚至在美学意义上,都是基于身体的“特殊”需求进行设计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壮观的技术发展——赛博格(Cyborg)。赛博格是由“控制论的”(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单词组合起来的新的词语。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把赛博格概括为“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③。这些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计算机时代已经将所有我们所有人变成了一种类型或其他类型的赛博格。赛博格作为一种身体既有第一性,又有第二性,是多元文化的共享世界。

① Blackman, L. *The Body: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Berg, 2008, p. 2.

② 参见“专为残疾人开发的数字技术”, <http://tech.163.com/07/0706/09/3IN7QL8N000926PT.html>, 2013-10-01.

③ [美] 史蒂文·塞德曼:《后现代转向:社会理论的新视角》,陈明达、王峰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赛博格既是可拆分的,也是可以重新组装的,是后现代的公共的 and 个人的自我。”^①这种赛博格所蕴涵的不仅仅是人和机器的单纯的融合,同时还意味着多重主体和多重客体的存在。由此,赛博格具有强烈的认识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隐喻意义,它解构了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对技术与政治关系进行了再思考。赛博空间和赛博格的发展被统称为赛博技术,其改变人类生活的潜力是巨大的:一方面,赛博空间的扩展为个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个性,而不必担心与脆弱的身体相关的束缚;另一方面,赛博空间可能会因为现存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而变得殖民化,并且被用来重构主体的社会性与身体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能力有办法彻底重构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依然是受种种条件限制的——这不仅包括身体的自然因素,也包括与身体相关的社会因素,以及种种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科学强化了对于身体的干预程度,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何为身体的知识更不稳定,相形之下,我们对应当允许科学在多大程度上重构身体做出道德评判的能力则显得赶不上趟儿了。”^②

除此之外,随着计算机科学与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人工生命技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宣布世界首例“人工生命”诞生,并命名为“辛西娅”(Synthia)。“辛西娅”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由蓝色细胞组成的基因组,也是第一种以计算机为父母的生物,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生长、繁殖、分裂,并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工生命。“人工生命技术与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合成、创造生命,后者是复制生命。”^③“辛西娅”的出现意味着创造出自然界完全不存在的高级生物是可能的,对人类DNA进行筛选或改造也是可能的。这比之前的“技术对肉体的入侵”又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在人工生命技术领域,肉体似乎

① Haraway, D. *Simians, Cyborg,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p. 163.

② [英]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③ 杜严勇、胡春风:《人工生命技术引发的哲学思考——全国人工生命技术的哲学思考研讨会综述》,《哲学分析》2011年第3期,第174页。

是可以不存在,或者可以消解的;并且,人工生命的出现还打破了自然物和人工物的界限,并有可能被滥用,这不仅会对自然界及人类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生命伦理、生命技术的社会效应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技术上的能够”(技术的实然层面)不等于“技术上的应当”(技术的应然层面)。技术本身存在的矛盾,归根结底在于技术进步与伦理选择之间的矛盾。在人工生命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人们不得不陷入某种忧虑:身体的明天和技术的未来会怎样?

随着技术的全面发展,身体逐渐成为“技术化的身体”。“技术化的身体”这一概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表明技术已经全面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意味着技术和知识已经内化了,开始侵犯、重建并不断地控制身体的内容,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这就引发了一种可能性,身体的有机空间和结构安排已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改变了,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身体的传统认知观,身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都面临巨大挑战。正如身体社会学家克里斯·席林^①(Chris Shilling)所指出的:“尽管理性化让我们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控制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使身体受到别人的控制,这种双刃剑的性质使我们不再那么确定,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身体,一副身体结束、另一副身体开始的具体边界何在。”^②因此,虽然现在我们具备了技术手段,能够对身体实施控制,但我们有关身体是什么,应当如何去控制身体的知识,却遭到了彻底的质疑。在很多人看来,当代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对身体的控制,但是也弱化了身体和机器之间的界限;身体的可塑性造成了身份认同危机,也对身体的自我认知带来巨大挑战;身体在获得最大程度的解放的同时,也面临异化和危机……,身体的不确定性问题影响深远。面对技术的挑战,我们必须回应诸如此类的问题:身体有无边界?倘若有的话,身体的边界在哪里?技术到底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技术与身体之间又究竟存在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① 注:也有学者将 Chris Shilling 译为“克里斯·希林”。在本书中,除尊重引用原文的考虑,一律用“克里斯·席林”。

^② [英]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在这种情境中,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他们并非如现代主义者所标榜的那样“知道”身体是什么,相反,他们认为“身体对所有人来说可能是所有的东西”^①。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身体被当作可以书写文化影响的‘黑屏’;当作身份认同的建构者;当作不可还原的差异的标志;当作支配性的微观权力的感受器;当作一种工具,借此身体/心灵、文化/自然以及其他代表传统社会思潮的二元对立可以得到解决;并且被当作所有体验的身体场所”^②。显然,主体的去中心化已经完成。技术进步正在促使人们对“不确定的身体”的关注。通过把“不确定的身体”放进社会和身体的参照系中,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观点也被相对化,即身体变得更有可塑性。“关于身体是什么,或者身体应该怎样分析,似乎没有达成共识。”^③但是,即便如此,被削弱的仅是我们对身体的感觉,而不是身体自身的肉体性。只是当身体的可塑性被当作符号时,它才更多导向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不仅仅是一副由生理组织构成的血肉之躯,而是呈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流动性、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二、从主体伦理学到身体伦理学

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奠定了西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从二元论立场出发,所有的思想以及知识本身,都被看作是自我与他者、身体与心灵、人与动物、健康与疾病、自然与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范畴之间的区分。“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正如‘自然’被看做隶属于‘文化’的控制一样,‘身体’也不断被看做是隶属于‘心灵’。”^④自由、平等、权利、义务和公正等自由人本主义的特征成了传统

① Shilling, C.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 8.

② Shilling, C.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 8.

③ Shilling, C.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 8.

④ Petersen, A. *The Body in Question: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8.